

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中国封建社会 农民革命哲学史略

襄樊市工人理论组
武大哲学系72级学员

前言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具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动员之广、威力之猛，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红旗卷起农奴戟”，“敢教日月换新天”。自从大泽乡一声惊雷，震垮了第一代封建王朝，直到太平军横扫妖魔，揭开了民主革命序幕。两千年中，在苦难中不断觉醒的革命农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不仅对奴隶主残余的复辟活动和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实行了猛烈的武器批判，而且，针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思想及其哲学基础，也在斗争中锻炼出了自己的批判武器。

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革命的阶级斗争是哲学智慧的主要源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名声若日月”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对孔老二这个“巧伪人”及其“擅生是非”、“妄作孝悌”的反动哲学所展开的愤怒批判，在哲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开创了我国劳动人民善于运用自己的批判武器从思想上打击敌人的光荣传统。在封建社会中，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始终高举着反孔斗争的大旗，成为反孔斗争的主力军。广大农民在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中，特别是在反抗剥削压迫、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中，在反对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妥协倾向和投降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日益提高了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形成了劳动阶级自发坚持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世界观基础。农民的革命哲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孕育、产生，并在每一次农民革命的高潮中，作为群众的智慧结晶，作为战斗的思想武器，通过农民自己的领袖、思想家的概括和总结而集中地表露出来。

哲学，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封建统治阶级苦心骗造“天命”、“神权”的谎言，竭力鼓吹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诡辩，目的是为了欺骗和麻痹人民，为了论证剥削压迫有理、革命造反有罪，妄图用这样的软刀子来“扫荡心腹之寇”，绞杀劳动群众的革命意识。农民的革命哲学，则与之针锋相对，为了唤起农民的革命意识，为了阐明剥削压迫有罪、革命造反有理，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对准“天命”、“天理”，“三纲、五常”

之类的核心，狠揭猛批，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正因为每次农民大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清算斗争，显示了农民革命哲学的威力，所以封建统治集团在每次农民大革命之后不得不变换他们的官方哲学的招牌。同时，这种与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农民的哲学批判，也直接推动了地主阶级内部儒法两家由政治分化而发生哲学路线的分歧和对立，促使一些法家思想家能够从农民革命斗争中吸取某些思想动力，从而使法家的进步哲学思想得到发展。

区别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农民的革命哲学在政治方向、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农民哲学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的政治灵魂，按照农民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就是要建立一个“等贵贱，均贫富”，人人平等，共同劳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这种从平均主义出发的幻想消灭剥削压迫乃至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理想，尽管“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但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它反映了劳动农民的革命愿望，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的微光”。这是任何剥削阶级的进步哲学所达不到的精神境界。其次，农民哲学是群众斗争大风雨中的活哲学，它的思想内容，不是书斋中和书本上的玄想、空谈，而是现实的群众革命实践的总结和指南。它以最简明的论纲，集中了群众要求，反映了时代潮流，往往能够抓住当时社会最本质的矛盾，因而能够击中反动哲学的要害。把封建统治者及其文化奴才长期铸造的精神枷锁，几锤砸个稀巴烂，使广大农民的思想得到解放，敢于“冲天”，敢于把封建“国典”斥为“邪法”，把儒家“经典”斥为“妖书”，宣布“小民从来不可轻”，“杀尽不平方太平”，表现了任何剥削阶级的进步哲学所不可能具有的革命性。农民革命哲学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根本不受剥削阶级传统哲学的烦琐、僵化的体系的束缚。写在起义旗帜上的口号、纲领，进行政治鼓动的歌谣、寓言，揭露反动派的革命檄文、政治神话，以及利用宗教外衣的“异端”、“异教”等等，都是农民革命英雄用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生动形式。正因为这样，农民革命哲学能够口耳相传，不翼而飞，与广大群众的实践密切联系，从而发挥出“一呼百万”的巨大的动员、组织作用。

历史上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极端恐怖和仇视。孔老二就一再惊呼：“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反中庸”！表明奴隶们早已拿起了反天命、反中庸的批判武器，并使奴隶主们胆战心惊。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卫士，从董仲舒到王守仁，全都自觉地把扑灭农民革命哲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们总结出的反革命经验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因而，他们强调要筑起“教化堤防”，加强思想统治，对广大农民心中的“邪思枉念”，要“痛加磨刮”；对每次农民革命，除了军事镇压之外，还必须实行文化围剿。为了掩埋农民革命思想，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来销毁、磨灭农民革命的各种文献，以致反映农民哲学的文字资料留下的极少；然后他们又放肆鼓吹唯心史观和愚民政策，宣称农民群众是“下愚”、“群氓”，造反的是“妖贼”、“草寇”，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哲学思想。资产阶级及其哲学教授们，也一贯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他们把自己的哲学冒充为“全民”哲学，把自己看作是具有“批判头脑”的“精神贵族”，把劳动群众诬蔑为“精神空虚”的“芸芸众生”。所以他们也同样地宣称，在所谓“哲学殿堂”里必须排斥劳动群众。千百年来，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就这样一笔抹杀了劳动人民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这是不能容忍的。

恩格斯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史阵地，面临着一个严肃任务，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恢复劳动人民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固有地位。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重新搜集、认真发掘被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掩埋了的有关历史资料，是十分必要的，但关键问题在于彻底批判封、资、修的反动哲学史观，彻底破除旧哲学史体系中长期形成的传统偏见。

例如，有一种偏见，即认为以往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知识，所以没有哲学。这首先是把更好表达和研究哲学的某种条件，错误地夸大为产生和形成哲学的根据；其次是对所谓文化知识，也只是局限于资产阶级一家的标准。其实，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出哲学，而不是文化知识出哲学。劳动人民从来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尽管他们身受残酷剥削压迫，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从事专门研究的权利，但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拥有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并随着实践的发展，适应斗争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括和总结。毛主席教导说：“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而始终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劳动阶级，当然有自己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真知”，有自己的主义，有自己的哲学。这是任何剥削阶级的文化偏见所抹杀不了的。而剥削阶级的“秀才”们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所炮制的各种反动哲学，不过是与这种哲学真知相对抗的一大堆谎言而已。正如列宁揭露的：“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

又如，另一种偏见认为，农民革命的纲领、口号等只是一些反压迫、反剥削的政治思想，那不是哲学。这是把政治和哲学截然割裂，并把资产阶级鼓吹的虚伪的超政治、超功利的所谓哲学标准，用来衡量农民的革命哲学。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从来是密切结合的。任何政治斗争的纲领、口号都以一定的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任何哲学都是它所属阶级的政策的特殊形态，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政治是灵魂。“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农民革命哲学的特点和优点，正在于它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并通过政治斗争的纲领、口号等，高度集中地表现了农民群众为了改造世界而作出的对世界的说明。

还有一种偏见，认为劳动人民的活哲学只是些个别观点，不成“体系”，所以不算哲学。其实，哲学的观点和体系并无质的差别，体系不过是某种观点的展开，而某些根本观点则是体系的核心和基石。翻开剥削阶级的哲学史，真正自成“体系”的哲学也少得可怜，大多数所谓哲学家也只有某些基本观点，并混在大量的空洞、烦琐的废话之中，往往经过徒子徒孙们一再加工整理才逐步形成某种系统学说。至于那些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自认为是“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恰好是阻碍人类认识发展的反动桎梏。劳动人民总结自己斗争实践的活哲学，言简意赅，生动活泼，它所表达的一些根本观点，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恰好代表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主流。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指引下，我们在编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初步认识到，否认劳动人民有哲学，抹杀劳动人民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传统偏见，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反动唯心史观在哲学史领域里遗留的一个旧“痕迹”。为了扫除这个旧“痕迹”，打破中国哲学史的旧体系，我们首先整理出这份《农民革命哲学史略》，对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革命哲学作一粗略的论述，内容还极不完备，分析更有待深入。但我们坚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并与专业理论队伍相结合的共同奋斗中，一部科学的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哲学史必将编写出来。

一、秦末农民革命领袖陈胜、吴广的

“贵贱无种”的反天命思想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历史上农民群众第一次掀起

的反压迫、反复辟的革命风暴。这次起义，不仅用革命暴力扫荡了赵高、胡亥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推翻了第一代封建王朝，打击了封建统治，而且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对儒家唯心主义天命论及其反动思想路线实行了猛烈的批判，在哲学史上树立了农民革命哲学的第一面战斗旗帜。

反天命的无神论思想

陈胜又叫陈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人；吴广又叫吴叔，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他们都出身贫雇农，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是赵高篡权复辟以后所受到的生死线上的熬煎，使他们早就产生了革命造反的思想。陈胜在“与人佣耕”时，就曾向几个雇农伙伴倾吐了他蔑视天命、向往革命的“鸿鹄之志”。他说：“日后谁富贵了，可不要忘记一起干活的受苦弟兄啦。”这句话，表达了千百万农民要求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当李斯等满足于“富贵极矣”而赵高之流正在策划复辟阴谋的时刻，胸怀“鸿鹄之志”的革命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要冲决网罗，求得解放！

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等九百名贫苦农民被征调到千里以外的渔阳去服兵役。当他们被押送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的刘集村)时，被大雨困阻，延误了报到期限。按秦朝法律，误了期要被处死。面临等死、逃亡，还是反抗的选择关头，陈胜、吴广以革命农民的坚定立场，毅然发动起义，并向大伙进行革命动员说：“咱们逃亡是死，造反也不过是死，同样是死，起来造反为劳苦人民打天下而死，不是更好吗？！”“咱们硬骨头不死便罢，死也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且壮士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史记·陈涉世家》)这表明，陈胜、吴广在斗争中意识到了“不是战斗，就是死亡”的革命真理，并坚信只有同反动统治者作殊死斗争，才能打出人民的天下。他们所说的“死国”，就是要为劳动人民打天下而战，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他们号召“举大计”、“举大名”，是以革命造反精神鼓舞起义壮士，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为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而英勇奋战。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首先需要彻底粉碎反动的天命论这付精神枷锁。长期以来，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竭力宣扬天命论，捏造一个主宰一切的“上帝”，并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受“上帝”之命来统治人民。孔老二拼命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上智下愚不移”，目的是把富与贫、贵与贱、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关系，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永世不能改变。奴隶们起来造反，就是“犯上作乱”，“获罪于天”。奴隶主贵族们是天生贵种，所以应该享有世袭特权，而劳动人民则世代都只能是奴仆臣妾。这种以天命论为理论基础的“贵贱有种”论，正是孔孟儒家用来维护世袭等级特权的全部反动哲学的核心。对准孔孟之道的核心，陈胜、吴广响亮地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论纲领。它明确宣告：统治劳动人民的帝王将相，并不是天生的；社会上的富贵、贫贱，也不是老天爷安排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主宰一切的“上帝”。统治和被统治的地位，完全可以通过斗争来加以改变，黄泥巴腿子可以踢倒帝王将相，自己做社会的主人。这种反天命的无神论思想，是对“君权神授”、“贵贱有种”等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是对孔孟儒家鼓吹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安贫乐道”、“劳而无怨”之类反动谬论的有力驳斥，也是对“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世袭等级制的深刻批判。

在“贵贱无种”的反天命思想的指引下，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陈胜、吴广准备派大将周章直捣秦都咸阳。这时，混进起义军队伍的孔老二的八代孙孔鲋跳了出来，妄图阻止农民军

前进，又摆出天命论来，狂叫什么“祸福凶吉，大者在天”，要陈胜停止进军，并威胁说：否则“悔之无及”。陈胜当即痛斥孔鲋说：我们起义军的事，与你无干，用不着你胡言乱语；并指出：你所讲的天命论那一套我不懂，还是讲“人间近事”吧！（《孔丛子·问答》）这是陈胜继柳下跖之后对孔老二胡诌的“天命”、“鬼事”的尖锐批判，表现了革命农民不信天命、只信人事的“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

“吾自举”的革命首创精神

陈胜、吴广在领导起义军奋战过程中，发扬了“吾自举”的革命首创精神，战胜了“法先王”的儒家复辟路线的多次反扑。

在要不要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问题上，陈胜、吴广与以陈余、张耳为代表的儒家复辟路线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当起义军一举攻下了河南陈县这个军事重镇之后，革命农民准备建立政权以适应革命的迅猛发展。这时，钻进革命队伍来从事破坏活动的陈余、张耳等奴隶主复辟势力，跳出来疯狂反对。他们死抱着“贵贱有种”的反动血统论不放，又大肆贩卖孔老二“兴灭继绝”的复辟之道，反对建立农民政权，妄图诱骗陈胜首先去“立六国后”，即把已经灭亡了的六国奴隶主旧贵族的后代重新立为诸侯，以达到他们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目的。他们又是哄骗，说这样做才是“以德服人”；又是威胁，说如果陈胜要自己称王，“天下人心就会瓦解”。（“今独立陈，恐天下解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陈胜对他们这种“法先王”、搞复辟的反动主张给予了坚决回击，毅然决定在陈县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张楚”，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第一次掌握了印把子。

农民政权建立后，在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上，陈胜等又与孔鲋为代表的反动儒生展开了一次短兵相接的论战。孔鲋这个顽固坚持复辟路线的反动儒生，在“张楚”政权初建时，趁机叫嚷：从前周朝代替殷朝，首先实行了“兴灭继绝”的施政方针，现在必须效法先王，就必须把六国旧贵族重新扶植起来，这是头等大事。（“兴灭继绝，以为政首”——《孔丛子·问答》）陈涉站在农民阶级反复辟、反倒退、反对法先王的坚定立场上，对孔鲋的这些“进言”给予了迎头痛击，义正词严地指出：“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同上）断然拒绝了封六国后的复辟主张，尖锐地批判了孔鲋所鼓吹的“法先王”、“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并鲜明地提出了与“法先王”根本对立的“吾自举”的革命口号。“吾自举”，就是农民革命造反，有自己的路线、自己的政纲，走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政权。“吾自举”与“法先王”是两条路线的对立，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革命路线的对立，也是劳动人民的解放靠自己的革命历史观和向后看、开倒车的反动历史观的对立。“吾自举”的口号，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在冲破了天命观的束缚后所发挥出来的革命首创精神。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奋臂为天下创首”的革命精神，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揭竿而起”的革命传统。它不仅打击了复辟逆流，推翻了秦二世的反动统治；而且在思想战线上继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之后，又一次以劳动人民自己的批判武器，对孔孟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革命的扫荡，在我国农民革命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二、汉末黄巾大起义的改天换地的革命哲学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专政，豪强大地主势力恶性发展。他们拥有“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失去土地，“奴事富人”，“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公元一〇八年以后的几十年间，先后爆发了大小百多次农民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一次比一次多，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公元一八四年，由张角领导的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张角，河北巨鹿（今平乡县）人，是个很有威望、很有组织才能的农民领袖。他吸取了以往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要推翻反动统治，不仅要有强大的革命武装，而且还需要有严密的组织和动员广大农民起来造反的思想武器。他利用了“太平道”这一宗教形式，以传教和给人民治病为名，经过十几年的秘密宣传和组织，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发展了几十万贫苦农民。张角把他们分为三十六方，小方六七千人，大方一万人，每一方设一首领，便于统一指挥。起义军决定在甲子年（公元一八四年）举行起义。张角一声号令下，头裹黄巾为标记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军，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向东汉王朝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旬日之间，天下响应”，席卷半个中国，把东汉地主阶级打得落花流水，把董仲舒以来用“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加了工的孔孟之道冲得七零八落。革命农民在战斗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哲学思想。

“黄天太平”的政治纲领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农民大起义。张角利用和发挥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太平经》中蒙上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思想，制定了黄巾起义的政治纲领，就要推翻剥削压迫农民的封建政权，建立“黄天泰（太）平”的理想社会。他们用宗教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认为天地化生万物，本是公平无私的，人类社会应该不分尊卑大小，人人平等（“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太平经》卷49）。他们根据这一平等的政治原则，决定推翻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建立一个“相爱相通，无复有害”（《太平经》卷46），“凡事悉治，无复不平”（同上卷48）的“太平”世界。

为了建立“黄天太平”的世界，起义军每到一处就“燔烧官府”，打击儒生，矛头对准封建政权。在黄巾军内部，则建立起了“太平世界”的雏型，他们冲破儒家一套封建纲常的等级原则，不称君，不设官，群众对各级首领直接呼喊反映其特征的外号。首领和群众之间建立了“相爱相通”的亲密关系。广大劳动妇女挣脱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精神锁链，杀向了反奴役、反依附、争平等、争自由的战场。和黄巾军同信一个教、同走一条道的张鲁“五斗米道”，响应黄巾起义，在汉中建立农民政权后，“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官兵之间人人平等，并废除了封建的严刑酷法，对犯错误的人实行说服教育为主。（《三国志》卷八）起义军所建立的这种革命新秩序，部分实现了“黄天太平”的政治理想，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和反动的孔孟之道。

黄巾起义还提出了财产公有、“人人各衣食其力”的经济纲领。起义军领袖被称为“天公”“地公”、“人公”将军，把“公”字作为起义的旗帜，表达了他们在经济上反对剥削、实行财产公有的强烈愿望。他们认为，天下的财物是用来养天下人的。府库的钱粮，也不是“给一人”，

只能“共取”，不能“独有”。（《太平经》卷67）从这种财产“共有”、“共养”的理论出发，他们反对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说教，认为既然“天生人，幸使人人有筋力”，就应该“各衣食其力”，人人都靠劳动来生活。但是剥削成性的地主阶级却将“天地中和之财”，大量金银财宝据为己有，“封藏于幽室”，令其腐烂。“见人穷往求，骂詈不予”，或者“必求取增倍”，使广大穷苦人民“饥寒而死”。这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罪大恶极，“百神憎之”。他们痛斥这些贪得无厌的剥削者是“仓中之鼠”，“为天地间大不仁人”，“其罪当死”！（《太平经》卷67）。

在财产公有、“衣食其力”的革命思想指导下，起义军每到一处，首先围攻豪强地主聚居的庄园，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夺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造成了“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局面。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后，还在大路旁设置“义舍”、“义米”，来往农民住宿、吃饭不要钱，深受群众赞扬。这种财产公有、人人劳动的社会理想，充分表达了农民的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要求。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黄巾起义为了实现革命的“太平”理想，提出了反映农民革命要求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董仲舒炮制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两汉统治者的官方哲学。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居高理下”，统治着人间的一切。封建帝王是“天子”，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人民的。劳动人民再苦再穷，也只能听天由命，让那些“承天意以行事”的统治者任意摆布。东汉统治集团把这种“天命论”发展为更烦琐、更荒诞的谶纬神学，加紧从思想上来奴役和愚弄人民。

劳动人民要造农奴主的反，首先就要革“老天爷”的命。张角在领导黄巾起义过程中，利用《太平经》中包含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提出了“物始于元气”（《太平经》卷67）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元气”的分合，“恍惚自然”，没有意志；由于“元气”的分合而“成天”、“成地”、“生人”，产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太平经钞》《戊部》）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从孔老二到董仲舒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为起义农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争扫清了思想障碍。

劳动人民从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认识到，生产的好坏，万物的兴衰，是与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相联系的（“夫天地之为法，万物兴衰，反随人故”——《太平经》卷65）。而人们的贵贱地位，也像万物的兴衰一样，是由人来决定的（“凡人兴衰，乃万物兴衰，贵贱一由人！”——《太平经》卷65）。这种“贵贱由人”的思想，是秦末农民起义的“贵贱无种”的反天命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表明农民在斗争中摆脱了天命论的束缚，意识到了在生产斗争中，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可以改造自然；在社会生活中，被压迫阶级依靠自己起来斗争，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揭破了“富贵在天”、“听天安命”之类的谎言，大灭了反动阶级的威风，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鼓舞了千百万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斗志。

孔孟之道的狂热鼓吹者董仲舒，为了论证封建统治的永恒性，还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所谓“阳尊阴卑”的反动理论，否定上下、尊卑的地位是能够相互转化的，妄图以此阻止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争。革命农民根本不相信这一套骗人的鬼话，针锋相对地指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要走向它自己的反面。（“夫阳极者能阴，阴极者生阳，此两者相转，比若寒尽反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数也”。——《太平经》卷36），因此“阳极者当反阴，阴极者当反阳”（《太平经》卷42）。人们应该利用这种“自然之数”，来促使事物的转化。他们把这个“反”字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极于下者

当反上”的革命变革思想，号召受尽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下层劳动人民起来造反，推翻统治者，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黄巾起义的战斗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正是从这种朴素的矛盾转化观所得出的光辉结论。它告诉劳动人民，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苍天”已经死去，代表农民阶级的“黄天”应当建立。在社会矛盾尖锐到极点的甲子年起来革命，完全符合“自然之数”，一定能够成功。这就充分表现了黄巾起义军在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推翻旧政权、创造新天地的革命英雄气概。

每次农民起义，都给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一个个封建王朝的瓦解和更替，都是农民起义的结果。革命农民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逐步认识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在黄巾起义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是一首气壮山河的战歌。它向统治阶级宣布，起义军的革命是正义的，是吓不倒、杀不尽、后继有人的。同时告诉劳动人民，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不是神仙皇帝，不是地主官僚，而是劳动人民自己。反动派没有什么可怕，人民力量才大如天。这种相信人民、不畏强暴的革命史观，对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反动史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为起义农民变革社会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豪强地主的残酷镇压下，黄巾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它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神权、政权、族权、夫权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狠狠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的反动政策，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迫使魏晋时期的门阀豪族不得不借助玄学来挽救孔孟之道。这次黄巾起义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纲领上，都比过去历次农民起义有显著发展，对后来的农民革命和儒法斗争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全文未完，待续)

.....

(上接第 91 页)学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唯心主义的杂质和理论上的自我矛盾，甚至在有些问题上，陷入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泥坑。这是当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下层革新派在政治上软弱性、摇摆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的必然反映。

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真正科学的世界观，也才能彻底揭露、批判孔孟之道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今天，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取得不断的胜利。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旧社会的死尸和臭气还依然存在，国内外阶级敌人还会利用儒家唯心主义黑线来搞复辟活动。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站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深入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